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6.01.009

20世纪50年代美国共产党的历史性反思及其失败原因探析

李东明，王梦谣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1）

摘　要：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共产党对党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审视”和历史性反思。但美共的历史性反思一开始就同当时的国际共运重大政治事件相互联系，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党内意见分歧。这次反思活动是美共纠正错误、寻求出路的一次机会，但美共在反思过程中针对如何看待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如何处理自身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如何化解党的分裂危机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出现了尖锐的内向性争论和对立，并逐渐演化为激烈的党内派性斗争，最终导致了党的分裂，酿成了战后美国共运史上最为惊心动魄、扼腕长叹的悲剧。由于外部与内部、主观与客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美共试图纠正错误、寻求出路的美好愿望在党内斗争和党的分裂中支离破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最终未能摆脱走向衰落的厄运。

关键词：美国共产党；历史性反思；失败；危机

中图分类号：D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6）01-0016-09

收稿日期：2025-11-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19FKSB039）：威廉·福斯特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基金重大规划项目（18XNLG05）：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1847—2017）。

作者简介：李东明（1986-），男，河南辉县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王梦谣（2000-），女，河南安阳人，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为摆脱困境、寻求发展出路，扭转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态势，自1956年初开始，美国共产党（以下简称美共）对党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审视”和历史性反思。但美共的历史性反思同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等国际共运重大政治事件相互联系。这些政治事件在美共党内形成一股暗流，影响了美共的反思，并导致其“陷入了一场长达四年的破坏性危机”①。这是美共历史上最为激烈、最为惊心动魄，也是对美共损伤最大的一次党内危机。全面梳理20世纪50年代美共的历史性反思、剖析其失败原因，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为何会在20世纪60年代走向衰落。

一、外部冲击、党内分歧与初步反思

20世纪50年代，美共面临新的国内国际形势。国内而言，麦卡锡主义专制时期的到来导致美共遭受重大损失，促使美共内部出现反思萌芽。国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及波匈事件等重大国际共运事件暴露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身及其前途命运的忧虑与反思。新形势引发的新问题尖锐地摆在了美共面前，要求其必须作出政策调整以适应形势的变化。但是，由于美共领导人的经验、阅历、学历与理论水平的不同，导致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各异，产生意见分歧在所难免。正常的党内意见分歧，如果不能通过党内民主等途径消弭分歧、达成共识，一旦与外部重大政治事件交织在一起，极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党内冲突。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以福斯特、丹尼斯、盖茨为各派主要代表，对美共造成致命性损伤的党内分歧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产生的。

（一）苏共二十大与美共党内分歧的初现

早在1955年6月，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ylovich Molotov）就曾隐晦地对美共《工人日报》的编

①Peggy Dennis,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American Communist: A Personal View of a Political Life*, 1925-1975, Westport: Lawrence Hill, 1977, p. 224.

辑建议：如果美共在目前的道路上没有成功，那么它应该尝试“另一条道路”①。同时，随着美共内部不满情绪的酝酿以及赫鲁晓夫领导下苏共内部反思活动的发酵，美共领导人尤金·丹尼斯也开始公开呼吁对美共的旧政策进行“新的审视”②。随后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为美共内部一些“批评家”创造了一个“绝佳”机会。

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作了一个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并呼吁恢复列宁时期的集体领导原则。他在讲话中宣称，苏联的目标是与西方和平共处，断言每个国家都必须不可避免地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③ 巧合的是，当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消息传来之时，美共党媒按照惯例正在为福斯特贺寿。但不同的是，在福斯特75岁生日的这一天，《工人日报》和《政治事务》不仅发表了关于福斯特寿辰的贺词，而且也介绍了赫鲁晓夫所作的批判“个人崇拜”的报告。《工人日报》更是鼓励共产党员畅所欲言，把更多的生日祝福和“好莱坞十人”④ 之一林·拉德纳（Ring Lardner）批评福斯特个人崇拜的信件放在一起发表。《工人日报》在信的后面附加社论称：“林·拉德纳的信提出了一些对美国左派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很高兴收到他的意见，并同样邀请我们的读者给我来稿”。此后不久，《工人日报》把信件专栏变成公开讨论党的困境的论坛。⑤这种情况下，美共广大党员的来信如潮水般涌向《工人日报》，甚至有党员为自己“浪费了15年或20年生命”而悲叹，声称美共已经“身败名裂，无法挽救”了，应当在羞辱中消失。⑥ 美共高层针对赫鲁晓夫的报告形成了意见鲜明的两派：一派以福斯特为首，为斯大林辩护，并且声称斯大林的错误并不等同于美共的错误；而另一派则是以盖茨为首，主张批判斯大林，要求对美共过去的政策进行全面反思。不久之后，美共内部的意见分歧趋于公开化。1956年4月底，美共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向全党传达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内容摘要。据斯蒂夫·纳尔逊（Steve Nelson）回忆：这份报告对美国的激进分子产生了压倒性的影响，“提出的所有问题现在都需要新的答案，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有现成答案的智慧之地，我们只能是靠自己了”⑦。随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全文内容的不断披露，美共内部意见分歧也逐渐深化。

（二）波匈事件与美共党内分歧的深化

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引发了共产主义世界内部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同样，美共内部围绕波匈事件的事态发展和苏军出兵行动等问题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1956年11月1日，美共全国委员会公开发表关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声明，指出波匈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照搬照抄苏联政策，导致“官僚统治的实行”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破坏”，也使本国的主权和独立遭到严重侵犯。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人民要求民主化和要求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以及要求他们在同苏联的关系中享受充分的主权和独立。⑧ 美共批评称，波兰和匈牙利政府联合苏军镇压人民群众的示威游行，是“一个悲惨的错误”，指出苏联的出兵行动，“违反了民族自决这个列宁主义概念观念的实质”⑨。美共强调：“我们有责任向美国人民说明，造成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是在斯大林时代后期发展起来的

---

①②⑤Edward P. Jobanningsmeier, *Forging American Communism: The Life of William Z. Foster*, New Jers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36, p. 336, p. 337.

③David Shannon,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ommunism: A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ince* 1945,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59, p. 272.

④指的是好莱坞10位拒绝为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作证的影界人士。美国国会众议院于1938年成立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委员会煽起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仇视和对进步人士的迫害。1947年秋，该委员会为了调查所谓“好莱坞电影业被共产党渗透的程度”而传讯了一大批好莱坞创作人员，其中有10人由于拒绝作证，不愿透露本人和周围熟人的政治身份而被华盛顿联邦法院以蔑视国会罪提起公诉，被判处最多一年的监禁和1000美元罚款，世称好莱坞十人案。

⑥Peggy Dennis,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American Communist: A Personal View of a Political Life*, 1925—1975, Westport: Lawrence Hill, 1977, p. 225.

⑦James R. Barrett, *William Z. Foster and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Radicalis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p. 254-255.

⑧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关于匈牙利事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210-211页，第213页。

那些偏差和压制……我们提出了对苏联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采取友好的但是独立的和批判的态度的必要性，认为这是兄弟的社会主义的关系和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唯一健全的基础。”① 这一声明表决时，美共全国委员会驻会委员以多数票通过，杰克逊（James Jackson）有条件地表示赞成，戴维斯（Benjamin Davis）和丹尼斯（Eugene Dennis）弃权，福斯特（William Foster）缺席。但之后福斯特迅速给《工人日报》写信，要求纠正声明中的种种错误，表示自己投票反对这项声明。全国委员会的部分委员也加入了福斯特的阵营，认为这项决议太过分了，而且低估了一个带有强烈反动性质的武装组织对共产党政府的威胁。但委员会全体成员并不同意福斯特关于整个事件都是美国“中情局革命”的论点。② 丹尼斯于 11 月 5 日在《工人日报》说明自己弃权而不赞成美共全国委员会声明的原因。他认为，委员会的声明夸大了苏联的责任而缩小了波兰党和匈牙利党在流血冲突事件中的责任，该声明指出了苏联过去在与波匈两党关系上所犯的错误，并未指出两党在处理与苏联关系上所犯的错误。③ 11 月 4 日，苏军大规模入侵匈牙利平息暴乱，更是激发了美共党内反思派及其同情者的不满。《工人日报》也收到了许多普通党员的自省文章和批评信。党内意见分歧进一步加大。以盖茨（John Gates）为首的反思派强烈谴责苏联的入侵，而以福斯特为首的老左派则称这次军事行动是“一种严峻的必要性”④，而丹尼斯则处于这两种立场之间。

波匈事件给美共带来严重影响，其党员数量从 1956 年初的两万人减少到 1957 年夏天的一万人。⑤20 世纪 60 年代初，美国左翼的活动似乎停摆，“政治几乎没有从广泛的镇压和对苏联的揭露的绝望中恢复过来”⑥。

（三）初步反思阶段美共党内各派争论的焦点问题及评价

首先，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一是如何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盖茨派肯定了赫鲁晓夫对揭露错误和纠正错误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但是不接受赫鲁晓夫只是从斯大林个人品质上去寻找斯大林时期所有错误和罪行的根源，认为这种将错误原因归结于个人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盖茨派赞成意大利党领袖陶里亚蒂（Togliatti）的意见，即对斯大林的崇拜及其所有的负面后果，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如何产生的。⑦ 1956 年 6 月 25 日和 7 月 19 日，美共中央委员会均发表声明重申类似立场。丹尼斯赞成美共中央委员会声明中所持的立场和观点。虽然福斯特也承认斯大林犯了“错误”，但他在分析斯大林错误原因时，指出由于苏联工业化的必要性、西方国家的敌对政策、纳粹政策以及冷战等，极容易导致斯大林采取这样的领导方法。⑧二是如何认识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盖茨派多次揭露斯大林时期的错误，也多次提及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官僚扭曲、压制民主等错误。福斯特派虽然不否认斯大林的错误，但很少具体谈及斯大林时期都存在哪些错误，指出美共不应该忘记斯大林政权的“积极”特点，告诫美共党员必须加倍警惕，不要落入对整个局势作出消极和破坏性总结的“资产阶级陷阱”，强调“重评斯大林”是俄国人的问题，不是美国人的问题。⑨

其次，关于美共的独立自主问题。盖茨派认为，苏共二十大的积极意义在于促使美共对自己的以往政策进行全面省思。虽然盖茨不知道美共摆脱孤立困境的良方和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但他得出了“美共在国外找不到答案”的结论，并且指出“我们必须站在自己的脚上，学会为自己思考，不要别人为我们思考，不要鹦鹉学舌”⑩。盖茨派与美共中央委员会在 1956 年 6 月 25 日发表的声明中，不点名地批评了福斯特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完全是苏联内部事情的观点，并且对该观点明确表示反对，认为“苏联在过去四十年里在世界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保卫它的社会主义成就的斗争，使得这些问题成为全

---

①③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关于匈牙利事件》，第 213 页，第 215 页。

②④James R. Barrett, *William Z. Foster and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Radicalis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p. 260-261, p. 261.

⑤⑦⑧⑨David Shannon,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ommunism: A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ince* 1945,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59, p. 360, pp. 296-298, p. 275, p. 275.

⑥Paul Buhle, Marx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nthly Review*, 2009, Vol. 61, Issue 1, p. 40.

⑩David Shannon,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ommunism: A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ince* 1945,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59, p. 282.

世界各地的公共问题了。”[①] 丹尼斯在个人声明中也指出美共紧跟苏联的错误。但福斯特坚称斯大林的问题只是苏共内部的问题，只字不提美共紧跟苏联的弊端，极力为苏联辩护。

最后，关于美共以往工作中的错误。盖茨派认为，美共过去曾支持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根据史密斯法起诉明尼苏达州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是极端错误的。同时，盖茨派指出美共应该考虑以和平方式夺取政权。这实际上是间接否定了美共之前的斗争策略。此外，盖茨派认为美共工作的重中之重应该是发扬党内民主，“并纠正由于自身与民众运动相脱离而产生的宗派错误”。[②] 1956 年 4 月，丹尼斯在美共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对党的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指出美共所犯的错误主要有：美共在统一战线上的“左”倾宗派主义错误、第三党政策上的错误以及党内以机械、教条主义方式运用其他党派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且持久的倾向等。[③] 在党内要求反思的强烈呼声下，福斯特也承认在自己的领导下，党发生了许多灾难性的转折，但是他将这些错误解释为面对资产阶级政府镇压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同时，他也承认美共的孤立状态并非不可避免，美共过去确实犯了严重错误：1948 年美共支持进步党导致许多工人疏远进步党；在史密斯法案审判中美共未能令人信服地描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重要性；为了维护组织安全采取了过激的安全措施等。但同时他也指出，这些政策并非出于自己一人之手，而是美共中央委员会的集体决策。[④] 在福斯特看来，美共所犯的错误以及现在所处的孤立状态，皆是现实形势使然而非主观导致。

二、全面反思与党的分裂

围绕国际共运重大事件的争论，只是美共内部分歧的初始阶段。随着美共反思错误、寻求革新的力度加大，福斯特等各派之间的分歧更加尖锐、争论更加激烈，意味着各派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也预示着党的分裂将不可避免。

（一）美共反思运动的全面开启

随着揭批活动的深入，盖茨派及其支持他们的党员要求对党进行彻底改革，这意味着美共反思运动的全面开启。盖茨派指出，美共的组织、结构、政策等必须从以往借用苏联共产党的模式中抽离出来，基于美国民主传统以及根据党的实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美共纽约党组织在讨论革新美共的问题时，更是提出是否应该改变党组织形式和名称这个更为胆大和出格的问题。党内甚至有人提出了解散美共和放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建议。

这种情况下，福斯特担心对党的错误的无限制揭露会导致美共的瓦解，因此他多次反对党内无休止和无拘束的争论，以免落入资产阶级的陷阱。但是党内要求反思错误的呼声愈演愈烈，即便是立场一贯较为中立的美共领导人丹尼斯也反对福斯特阻止党内辩论的做法，同时明确表示反对福斯特动辄给所有政治立场“扣帽子”的举动。但问题是，全面反思带来的却是愈发严重的取消主义观点。1956 年 9 月 23 日，美共中央通过的十六大决议草案，明确指出美共在过去的错误和弱点，强调“左倾宗派主义”[⑤] 导致该党高估了战争和法西斯的危险，并导致自己与劳工和黑人运动相脱离。草案强调，美共与其他共产党不能再像之前的父子关系一样，必须像兄弟一样互相帮助、互相批评。[⑥]但同时，草案也明确批驳了取消派及其取消主义的错误论点，不赞成改变党的性质和将党改组为宣传性或教育性团体的做法。决议草案在美共全国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所持立场介于盖茨派与福斯特派之间，但更接近前者。

对此，福斯特在美共党刊《政治事务》上撰文，指出该决议草案的主要问题在于“严重削弱了党对马克

---

①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关于匈牙利事件》，第 378-379 页。

②⑥David Shannon，*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ommunism*：*A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ince* 1945，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World，1959，pp. 282-283，pp. 303-304.

③Eugene Dennis，*The Communists Take a New Look*，New York：New Century Publishers ，1956，p. 21.

④Edward P. Jobanningsmeier，*Forging American Communism*：*The Life of William Z. Foster*，New Jers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 341.

⑤特别说明：原文中是“*Left sectarianism*”，为尊重和准确呈现作者的原意，笔者这里直译为“左倾宗派主义”。

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草案中的一些论断是“民族主义的异端邪说”。在此基础上，福斯特强调党所犯的一些错误只是战术性的，路线基本上是完全正确的，况且有些错误是“夸大的”甚至是“捏造的”。他担心目前党的自我革新，产生并助长了“现在折磨党的悲观主义和清算主义的瘟疫”①。显然，全面反思活动加剧了各派之间的矛盾与对立。

（二）美共全面反思阶段党内各派争论的焦点问题及评价

第一，关于如何化解当前的党内危机。福斯特认为党的危机并不是党本身造成的，主要根源而是在于：资本主义“繁荣”对工人阶级和党的腐蚀影响、政府对党的长期进攻、冷战时期所犯的“左”倾宗派主义错误、揭露斯大林问题产生的消极结果以及最近的严重右倾错误。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解决目前党内危机的具体意见。首先，重新肯定共产党的继续存在。他严厉批驳盖茨派关于把共产党变为一个政治协会的鼓动，他认为盖茨派对党组织的彻底改革行为不可取，这样无异于“从内部进行破坏”，只会大大削减党组织的力量和影响力。其次，重新支持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他批驳称，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割裂开来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是“右倾修正主义”，所走的方向是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方向。实际上，美共十六大的决议草案，已经明确反对盖茨派将党改组为宣传性和教育性组织的提议。与此同时，福斯特也承认，“这一时期特有的这些宗派主义式的错误，我个人也要负一份责任。”② 但他解释自己过去之所以没有谈论自己的这些错误，是因为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保卫党组织本身以及反对党内右派上，无暇顾及自己的这些错误。③

然而，丹尼斯则提出了与福斯特不同的观点。丹尼斯指出，目前的反思活动意味着美共“正在作一种痛苦的、深入的努力来纠正过去的错误”④。丹尼斯认为，美共全国委员会里所有的人都必须对这种情况共同负责，但“有些全国委员会委员们也许要更多负一些责任，这些人死抱着一成不变的政策不放，追求极端的政治目标，至少直到不久前还是如此”⑤。这里，丹尼斯不点名地批评了福斯特，认为福斯特的主张不利于目前党的反思活动。他反对福斯特简单地强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是强调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采取科学的态度。基于此，丹尼斯进一步指出革新党组织的必要性。他说：“在党的团结方面所发生的情况和过去十年的教训着重说明迫切需要大胆地革新我们党的各级领导，成立一个包括新旧党员中最优秀的人物在内的团结一致的机构。”⑥ 据此，丹尼斯又提出了四条加强党内团结的意见和方法。⑦显然，相较之下，丹尼斯的思路和建议比较契合美共当时的实际，也更具现实操作性。

第二，关于如何正确处理美共与苏共等外国共产党的关系。福斯特对美共紧跟苏共、缺乏独立自主的弊端闭口不谈，更多强调美共“目前危机中的一个显著的方面是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正在严重削弱”⑧。福斯特指出，这种弱点主要表现在“低估战争危险”“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几乎忽视资本主义总危机”“接受美国例外论的资产阶级学说”“攻击苏联”“藐视外国同志对于我们党的政策的意见”⑨ 等方面。福斯特认为攻击苏联、削弱国际主义的“不正确思想”对美共造成了严重损害。基于此，福斯特强调有必要“重新加强我们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⑩。盖茨派则是一贯强调美共紧跟苏联、缺乏独立自主性的弊病，也一贯反对苏联动辄干涉别国党内部事务的大党主义。但在丹尼斯看来，盖茨派否定苏联、否定社会主义国家一切的做法是错误的，但福斯特抱残守旧的观点也不可取。出于维护党内团结的需要，代表大会基本上采取了丹尼斯的意见，不顾盖茨派的反对，否决了以任何形式解散党，并且重申忠于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列主义，也不顾福斯特反对，强调要将马列主义的原则运用于美国实际，并且强调美共要独立于外国共产党，由自己来解释这些原则。

---

①David Shannon,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ommunism: A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ince* 1945,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59, pp. 305-306.

②③福斯特的观点可详见于《美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加拿大劳工进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6页，第1-7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丹尼斯的观点可详见于《美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加拿大劳工进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文件汇编》，第11页，第12页，第20页，第11-23页，第8页，第8页，第9页。

（三）美共十六大与党的分裂

出于解决各派纷争、维护党内团结的目的，美共于1957年2月9日至12日召开了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之前，党内各派所抱目的各不相同。盖茨派希望通过这次大会，美共能够实现组织革新、纠正错误，并且能够产生一种新的理论。福斯特派则期待将此次大会作为反对党内右倾修正主义的主战场，彻底消除修正主义在党内的负面影响。但是丹尼斯派则希望代表大会能够作出巧妙妥协，实现党的永久团结。在代表大会召开的第一天，丹尼斯和福斯特就在各自的报告中表达了明显不同的观点。丹尼斯对盖茨派和福斯特派均作出了批评。一方面，他批评了盖茨派取消党的做法以及重申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另一方面，他指出党已经陷入了一场“激烈的、分裂性的内部斗争，而又陷于瓦解的危险，强调党内可以存在意见分歧，但不可以有派系或者派系之争”①。福斯特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自己的意见“并不是与丹尼斯同志的主要报告对立的一个报告”②，但在讲话中他不讳言自己要与盖茨派决裂的意图，指出党的政治分界线是“想要保存共产党的人们和想要放弃共产党而代之以政治行动协会的人们之间划分”③。某种程度上，福斯特的讲话预示着党的分裂。

盖茨派与会代表人数不少，但不愿意重新开战和造成党的分裂，因此没有在大会上做公开发言。最终，代表大会在之前决议案的基础上，吸纳党内各派意见，作出了一个既不同于盖茨派也不同于福斯特派的统一决议。但是，决议上的统一，并未真正解决福斯特派与盖茨派之间最为关心的问题，矛盾也并未得到真正化解，两派对这次代表大会的结果都表示不满意。因此，美共十六大的统一决议并未建立在美共全党思想统一的基础之上。各派依然基于自身立场对决议作出有利于自己的阐释。美共十六大之后，党组织开始发生裂变。福斯特认为大会对右倾修正主义的批判不力，拒不接受也不服从大会的决议，而盖茨派由于之前期待大会能够作出彻底革新决定的愿望化为泡影，也对党丧失了信心。美共十六大召开后一年的时间里，党内派别斗争不断、内耗不止、组织分化严重。许多美共党员离开了组织，其中有些党员因为不同意美共十六大的有关决议而心生不满，还有一些党员因为对党内派别斗争而感到厌倦，对美共的前途完全丧失信心，不再相信美共能够摆脱困境、重整旗鼓。

三、福斯特领导美共对全面反思派的斗争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共的反思活动，被福斯特称之为洛夫斯东主义和白劳德修正主义的直接政治后裔。基于这样的认识，加上党内争论和反思活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福斯特领导美共与全面反思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一）美共党内争论的双刃剑作用

一方面，党内争论促进了美共的自我反思。随着自我批评的风气在美共内部形成势头，广大党员先前克制的闸门顷刻间坍塌了。在此过程中，美共党员开始控诉党在过去十年所犯下的种种错误。尤其是赫鲁晓夫的报告对斯大林犯罪行径的谴责，致使美共的党内争论和反思活动呈井喷之势。批评闸门的开启和心理冲击的积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动荡、个人崇拜的幻灭以及西方国家借机对共产主义的诋毁等在美共内部搅动。在反思中，美共认识到了长期受制于苏联、缺乏独立自主的弊病，也承认了党在过去犯了诸多的“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此时反思和纠错成为美共党内的流行语，也普遍反映了美共广大党员的心声。他们在严重的退却之后或者在遇到严重的危机时，将过去的很多政策推倒重来，提出了新的观点和新的思路。此时，美共开始考虑用共存代替冷战时期的心理学。须知，冷战心理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共的孤立状态，使得他们很难推行苏联的社会主义政策以及在美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党内争论，美共的一部分党员开始意识到不能抱残守缺，必须研究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形势、美国主流政治以及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黑人在内的广大美国人民的利益需求，根据美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必须对自己过去的政策作出合理解释，承认过去的错误行为致使美共不仅同自由主义者和广大民众的隔阂如此之深，而且也导致同美国的工人运动相脱离。以上种种，足以说明美共正在进入一个

①②③《美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加拿大劳工进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文件汇编》，第21-22页，第1页，第1页。

坦率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的新时代。按照佩吉·丹尼斯的话讲，“过去我们不成熟，把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过分理想化了。过去我们没有正视现实，也没有承认自己在未经测绘过的道路上行走时所犯的错误。”[①]在这种情况下，全党上下几乎达成了政党改革的共识，在坚持革新观念和改革美共的基础上，确立了渐进主义的发展模式。

但另一方面，党内争论偏离既定轨道，不仅导致党内政治生活严重失序，而且给党内外批评家贬损、污蔑、攻击美共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便利。明面上看，党内的政治意见分歧和争论是党内民主的重要表现，但是缺乏必要的共同思想基础和民主集中制纪律的维护，党内势必陷入盲目的无休止争论，党内政治生活就会失序，党内组织活动就会失范，甚至会导致派别斗争。如此，党内就很难形成共识，更不用说纠正错误、维护党的团结以及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影响力了。美共内部各派之间的意见分歧未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达成谅解，未能找到正确的方法形成思想上的统一，在外界的冲击下以及缺乏相应机制加以规范，犹如脱缰的野马到处横冲直撞，对党本身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古今中外政党兴衰史表明，缺乏相应的政党纪律规范，追求党内绝对民主，只会导致政党内部派别林立、组织分化、力量内耗等，最终被民众所疏远和遗弃。事实上，美共内部各派分歧尖锐、矛盾加剧，不但未能实现改革美共、纠正错误和摆脱孤立困境之目的，反而致使自己变得愈发孤立和弱小。同时，党内各派对美共过去政策错误的揭批和全面讨论，给党内外批评和反对美共的人以可乘之机。虽然美共内部争论并未专门对公众开放，但是美国很多报刊和新闻媒体还是报道了美共的路线变化和主张独立的情况。其中一篇报道美共十六大的新闻标题是：“美国红军致力于结束苏联的控制”，新闻开头第一句是“昨天，美国共产党正式宣布脱离苏联的统治而独立”[②]。同时，还有一批党外观察员受邀参加了美共十六大。观察员包括两个团体，一个是由宗教徒、和平主义者以及拒绝服兵役者组成的八人团体，另外一个是代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地方分支——纽约民权联盟。后者对美共持着较大的怀疑态度，但他们并没有在美共代表大会上发表批评性意见，而是将自己的意见交给了在场外徘徊的记者。[③]就此而言，美共内部争论已绝不是发扬党内民主那么简单，也不再局限于党内范围，而是极容易被敌对势力所利用。

（二）福斯特与全面反思派的斗争

美共十六大之后，以盖茨派为首的激进反思派和以丹尼斯为首的稳健反思派形成合流组成了党内全面反思派。由于立场、视角、认识、目标的不同，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福斯特与全面反思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1957 年，当福斯特和戴维斯要求撤销盖茨《工人日报》主编的职务时，遭到了丹尼斯的反对。实际上这并不是福斯特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要求，早在 1956 年，福斯特就曾建议撤销盖茨《工人日报》主编的职务，但被丹尼斯等多数人否决。福斯特以清算“右倾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之名，使用组织手段清除不同政见者的做法，引发很多党员的不满。1957 年 5 月，美共全国委员会在秘密投票时没将福斯特选入由 17 人组成的美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丹尼斯担心这会影响到党的团结和稳定，坚持要增选一名执行委员，才将福斯特选入执委会。在美共中央机构人事变动前后，美共再次出现退党浪潮。对此，福斯特认为这些人“走了更好”，并且要求对那些还留在党内但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进行组织纪律处分。[④]离开者中，许多人曾经是美共在群众运动中最得力的干部。

1957 年末，12 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举行联合会议，发表公告表示不愿继续深究在苏共二十大上所揭露的各种问题，更加激化了美共内部的矛盾。福斯特立即表示支持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公告，认为这份公告是自己立场正确的最好例证。福斯特派要求美共立即表示支持这个公告，并要求美共正式修改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以符合来自莫斯科方面的指示。与此同时，针对这份公告，过去参加盖茨派的那些人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他们其中一部分人要求美共谴责该报告是在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要求美共重申独立于莫斯科。但另外一些人出于同样的原因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建议美共全国委员会

---

①④Peggy Dennis，*The Autobiography of an American Communist*：*A Personal View of a Political Life*，1925—1975，Westport：Lawrence Hill，1977，pp. 225-226，p. 232.

②③David J. Saposs，*Communism in American Politics*，Washington：Public Affairs Press，1960，pp. 222，pp. 222-223.

针对此事不要采取正式行动。[①] 对此，丹尼斯重申美共十六大已经确定的立场：既要反对宗派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但是，党内福斯特派和盖茨派对丹尼斯的立场均表示不满意。福斯特斥责丹尼斯的言论是在与修正主义调和，而盖茨派则指责丹尼斯成为福斯特的教条主义的俘虏。[②]

盖茨派所把持的《工人日报》更是屡发"出格"言论[③] 以表示不满。由此，以及加上该报纸的发行量日益减少且办报经费日益紧张，美共中央开始考虑福斯特派关于《工人日报》停刊的建议。但是盖茨派坚决反对停刊，并以退党相要挟。1958 年 1 月 6 日，鉴于盖茨派的退党意图，美共中央决定解除盖茨在党内的一切职务。随着《工人日报》的停刊，盖茨退党并引发了新一波的退党浪潮。

在开展清除盖茨派分子的运动之后，福斯特又将斗争矛头转向了丹尼斯派。1959 年 12 月，美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致力于实现党的团结，但是福斯特却要求大会继续清算党内的"右倾修正主义"，并且反对丹尼斯担任任何领导职务。最终，福斯特被选为美共名誉主席，丹尼斯主动放弃总书记的职务，由葛斯·霍尔（Gus Hall）担任美共总书记，代表大会也确定了致力于团结的中央领导班子名单。[④]随着丹尼斯和福斯特相继逝世，美共的反思活动也悄然静止，但是党内反对"右倾"的斗争和派别之争的悲剧仍在上演。

结　语

20 世纪 50 年代美共的历史性反思既是内在矛盾张力作用的结果，也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本来，这次反思活动是美共纠正错误、摆脱困境的良机。但是由于外部与内部、主观与客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致使美共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反而激化了矛盾，加剧了党的分裂，酿成了二战后美国共运史上最惊心动魄、扼腕长叹的悲剧，致使美国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走向衰落。

从外部因素看，苏共无疑是导致失败悲剧的外因，它加深了美共内部的意见分歧，激化了矛盾，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苏联存在时期，谁有资格来担任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要符合什么样的标准才能担任领导人，这些都要由莫斯科来决定[⑤]。美共长期在经济上依附苏联，行动上也往往受到苏共的制约。同样，美共的历史性反思，局面之所以变得如此错综复杂，这同苏共的干预紧密相关。苏共担忧美共内部的力量角逐，一旦盖茨派胜出就不再受苏共的掌控，毕竟盖茨派坚决主张美共应摆脱苏联控制实现独立自主，这是苏共不愿看到的结果。因此，苏共一方面扶持亲苏的福斯特派并支持福斯特同以盖茨为首的激进反思派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对以丹尼斯为首的有限反思派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变原有立场。在苏共的干预下，党内意见分歧逐渐演化成了激烈的派性斗争，美共的历史性反思以盖茨派的退党或被清除出党而告终。这不仅扼杀了美共通过历史性反思来纠正错误、摆脱发展困境的良机，也扼杀了美共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美国化和本土化的尝试。反思活动之后的美共更加紧随苏联，制定的政策和斗争策略也愈发脱离美国的客观实际。

从内部因素看，就当时美共的普通党员而言，他们对历史性反思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他们基本上都是受到外来冲击，悲叹自己为党的付出和生命的浪费。在反思过程中，大批党员由于对党不再信任或对党的错误而感到羞耻，或是不赞同党的理念主张，或是厌恶了党内的派别斗争，纷纷选择退党，甚至有人在退党之后站在了美共的对立面，贬损和攻讦美共及其所力推的共产主义运动。选择继续留在党内的那些人，虽然他们知道美共之前紧跟苏联的弊病，但更多选择坚信苏联社会主义和美共的前途一片光明，依然坚信美共即便是存在个别错误，也不足以影响他所代表的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同时他们其中一部分人长期受到国际共运"左"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往往罔顾事实和党的危机，不愿意去面对党越发孤立的客观

---

①②④Peggy Dennis, *The Autobiography of an American Communist: A Personal View of a Political Life*, 1925—1975, Westport: Lawrence Hill, 1977, pp. 233-234, p. 235, pp. 237-239.

③鉴于盖茨在《工人日报》发表评论，批评党史学家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在小册子中为苏联入侵匈牙利的真相辩护，党干脆关闭了报纸。（Howard Brick & Christopher Phelps, *Radicals in America: The US Left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73.）

⑤James P. Canno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Trotskyism*, NewYork: Pathfinder Press, 1972, p. 36.

事实，因而也不愿意去进行深刻的反思，更认为美共毫无反思与革新的必要。

从主观因素看，美共缺乏既锐意进取又能把舵定向的坚强领导人，这注定美共反思过程中的群龙无首、矛盾和对立尖锐。虽然福斯特在党内具有较高威望，但他固有的教条和“左”倾思想导致其无强烈的反思意愿，反思极其有限。同时他对美共过去政策的错误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也决定了他难以摆脱思想包袱全身心投入反思大潮之中。盖茨虽然年富力强且有胆识有魄力，也具有强烈的反思意愿，但是他操之过急、用力过猛，毫不顾忌美共内部其他各派的态度以及党员的理论认知水平，强力推行组织变革，势必会招致阻力和反对。因此，盖茨派的激进反思不但没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党内矛盾，致使党内政治生活失序、思想混乱、价值失范、组织分化。此外，盖茨虽然在党内身居要位，但毕竟年纪较轻、资历尚浅，威望和影响力尚不能够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因此难以担当起领导美共历史性反思的大任。与福斯特、盖茨相比，丹尼斯似乎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他在党内资格较老，且具有较强的反思意愿，同时对美共过去政策也不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但是他缺乏撕开苏联“铁幕”的胆识、勇气和魄力，在反思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焦虑不安、犹豫不决和左右摇摆。他既认识到了反思的必要性，但又担心反思会动摇美共的组织基础。他既支持党内就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争论，但又担心争论会酿成党的分裂。他既渴望摆脱老左派旧有的领导模式，但也担心全面反思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主观条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美共历史性反思的过程必然是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其结果必然是头破血流、遍体鳞伤。

从客观因素来说，美共历史性反思的失败，是制度安排、权力结构使然。当时国际共运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有利于领袖权威的形成，但也成为领袖实现自身思维和行为变革的束缚。苏共二十大之后，旧有的制度安排和权力结构虽然出现了松动，但内在的固化势力依然强劲。这种势力足以抵挡得住任何反思和改革潮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对这种反思和改革潮流形成压倒性态势。因此，在制度安排和权力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等重大国际共运事件势必会对美共的反思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虽然促进了反思，但造成了思想混乱；虽然揭露了错误，但动摇了信仰；虽然深化了讨论，但酿成了党的分裂。

The Historical Reflec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50s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Failure

LI Dong-ming, WANG Meng-yao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mid-1950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CPUSA) undertook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 on the work of the Party. However, from the outset, the Communist Party's historical reflection was linked to the major political ev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movement at the time, which resulted in seriou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within the Party. This reflection wa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U. S. Communist Party to correct its mistakes and seek a way out. However, in the course of this reflection, sharp inward-looking arguments and confrontations arose over a series of key issues, such as how to look at the Party's mistakes in its past work, how to deal with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CPUSSR), and how to resolve the Party's crisis of split, and these evolved into a fierce intra-party factional struggle, which ultimately led to the split of the Party and the most alarming situ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 in the post-war period. It eventually led to a split in the party, creating the most shocking and strangling tragedy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Communist movemen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ctors, both external and internal,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the American Communist Party's good intentions of correcting its mistakes and seeking a way out were shattered in the internal struggles and the party's split, and the American Communist Movement was eventually unable to escape from the fate of going into decline.

Keywords: CPUSA; historical reflection; failure; crisis

[责任编辑　如初]